

# 社會主義在世界史中的意義

塚川 伸明

## 一

1989年蘇聯東歐發生巨變，時值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在那前後一段期間湧現的形形色色的法國革命論中，擇其犖犖大端者籠統言之，以下兩種見解特別引人注目：第一種見解認為法國大革命根本不應該像過去那樣被當作「人類進步的里程碑」，它只是為了實驗狂妄的「進步」思想而作出了重大犧牲的悲劇性事件。根據這一觀點，法國革命旋渦中的「恐怖行為」並非進步所難免的代價，而是表明崇尚進步的革命思想可以變得如何殘忍的一種象徵。因此，繼承了法國革命精神的俄國革命在斯大林時代引起大規模的恐怖行為，這可以說是所謂革命的必然結局。

與此適成對照，第二種見解反對所謂法國革命迄今已經失卻往昔的榮光的論調，認為其進步的意義不可否定。在紀念法國革命二百年之際，東歐各國出現了1989年的市民造反（東歐革命）的事實，意味着自由、民主、人權的思想終於波及東歐各國，從而再次確認了法國革命在當今的意義。

以上兩種對法國革命的評價南轅北轍，但有一個共同點，即都以社會主義的現狀作為論述的背景。不僅如此，二者對社會主義也都持否定的態度：第一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承襲了法國革命的負面因素，第二種觀點認為打倒社會主義的市民運動才是法國革命的繼承者。在二十世紀臨近終結的時候，各種回顧和反思法國革命的有代表性討論，皆一致以否定的態度總結社會主義，這正是當今世界狀況的寫照。

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在慶祝某一歷史大事件幾十周年或一百周年時，對該事件的社會興趣會驟然高漲；然而，在慶典完結以後，就像走過場的葬儀的結束之後似的，時過則境遷，對該事件的關心也就迅速消退。法國革命二百周年是如此，明治維新一百周年（1967年）、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1983年）的紀念活動也是如此，彷彿是要劃條置之度外的界線。莫非存在這樣一種心理作用：只要在紀念日舉行了盛大的慶典，只要寫足了論文、作足了講演，以後就不妨堂而皇之將它忘卻？

二十世紀臨近終結的時候，各種回顧和反思法國革命的有代表性討論，皆一致以否定的態度總結社會主義。我認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和崩潰是二十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僅僅因為它現在解體了就把它忘得一乾二淨，這樣的態度是不妥的。無論價值判斷如何，俄國革命和社會主義都不能不是總結二十世紀的坐標軸。

更有甚者，俄國革命還不到八十周年，現實的歷史進程已經把它掩埋掉了，甚至連安葬的儀式也不必有的。但是，正因為它是那麼輕易地被棄如敝屣，反而讓人覺得還是有必要再進行一番鄭重其事的安葬儀式。連像樣的葬禮也給省略了的、被過於草率地扔進歷史垃圾箱的死者，說不定甚麼時候還會借屍還陽、企圖復仇呢！我絲毫無意為死者揚幡招魂，卻認為至少應該進行審慎的屍體解剖和安葬的工作。不考慮社會主義就無法討論法國革命兩百年這一事實也表明：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和崩潰是二十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僅僅因為它現在解體了就把它忘得一乾二淨，這樣的態度是不妥的<sup>①</sup>。無論價值判斷如何，俄國革命和社會主義都不能不是總結二十世紀的坐標軸。

## 二

如前所述，主張法國革命迄今仍具有「進步意義」的觀點，其所持的一個根據是1989年的東歐革命繼承了人權思想。另一方面，現在依然擁護俄國革命的人則往往強調歐美資本主義正是受到俄國革命的衝擊才轉變為「福利國家」的。言下之意在於：即使社會主義的實驗對於俄國是災厄，但俄國革命卻有益於其他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向更靈活的機動、更安定的狀態轉化。

即使社會主義的實驗對於俄國是災厄，但那些依然擁護俄國革命的人則往往強調，歐美資本主義正是受到俄國革命的衝擊才轉變為「福利國家」的。言下之意在於：所謂革命似乎不是為了實際從事革命的國家謀幸福，而是為了其他國家謀幸福，玩味其言頗有點諷刺意味。

照這麼說，所謂革命似乎不是為了實際從事革命的國家（法國、俄國之類）謀幸福，而是為了其他國家（法國革命之於東歐各國，俄國革命之於歐美各國）謀幸福，玩味其言頗有點諷刺意味。遭受俄國革命後災厄的人們，即使是得到為美國或西歐的資本主義更上一層樓作出了貢獻的恭維，也未必會感到某種報償的慰藉吧？當然，從世界史的整體發展來看，上述歪打正着的效應也並非無稽之談。但問題是，怎樣才能使俄國及東歐的國內對社會主義的理解與其外部對社會主義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的理解綜合起來呢？

把俄國革命和社會主義放到整個世界史中來看，它當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面臨世紀之交的今天，形形色色的人都在大談如何認識二十世紀云云，同時也有許多人提出「始於1914年、終於1991年的短暫的二十世紀」的觀點<sup>②</sup>。不言而喻，19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年頭，1991年是蘇聯解體年頭。如果考慮到俄國革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激盪中爆發的事實，那麼可以說，俄國革命和蘇維埃體制的開始和終結就構成了「短暫的二十世紀」的主要內容。

毫無疑問，「二十世紀」的歷史時代並不能以社會主義一言以蔽之，縱使它的體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確實包括了人類相當大的一片天地，但歸根結柢它只是世界的局部而已。更符合常識的說法倒是所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消長動靜主導了世界史的整體。然而，即使持這種說法的人一般也都承認：社會主義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演變過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近年來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則以間接的方式又一次給資本主義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其實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等人的

「短暫的二十世紀」論也並非正面闡述社會主義國家本身，而是從社會主義國家對外部世界的影響的角度來觀察和討論它在二十世紀的地位。甚至在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作為主要對象來考察「二十世紀體制」的場合，人們也強調本世紀前期的「自由主義危機」動搖了對市場的信賴，而令政府的作用有所增大；不過，這種論調到本世紀後期發生逆轉，出現了重視「政府的失敗」而不是「市場的失敗」的動向。這一系列變化的背後，都有社會主義的興盛和衰退作為默示的前提條件<sup>③</sup>。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在二十世紀的世界史中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的判斷，已經成為超越立場和觀點的共識。但是，大多數情形下的討論不是來自（舊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內部而是來自其外部。況且，為數不多的來自內部的討論亦被最近的解體這一事變本身所壓倒，很難在思辨與現實之間保持適當的距離。舊蘇聯東歐的許多人們正在全力以赴暴露社會主義的陰暗面，似乎已經沒有餘裕再考慮社會主義到底在世界史中扮演了何種角色的問題。那麼，有沒有可能一方面保持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反省性觀點，同時又從容暢談「世界史中的社會主義」呢？以下就是為此目的所作的嘗試性論述。

### 三

縱覽1917年以來的八十年，社會主義在世界中沉浮的經歷可以概括如下：

眾所周知，1917年的俄國革命引起了褒貶不一的激烈爭議。當時，革命後的社會的實際情形尚不明朗，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因而受到了巨大的震撼。當蘇聯終於渡過從20年代到30年代的封鎖、孤立狀態下的重重難關，建立起被稱為「計劃經濟」的體制時，人們對其實踐有種種或肯定或否定的不同評價，但有一點看法卻是相同的：真正驚天動地的大事件發生了。與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蕭條相對照，更加深了人們對它的印象。法西斯主義、羅斯福新政、還有戰後的福利國家，全都是以不同的方式接受社會主義影響的嘗試。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社會主義的確風靡一時。

當蘇聯終於戰勝了納粹德國這一強敵時，社會主義的影響力進一步增強。二戰之後，「蘇聯陣營」在地理上擴大了勢力範圍，在國際政治中提高了地位。人類歷史上最初的人造衛星由蘇聯發射成功（1957年），使美國感受到深刻的衝擊。總之，到1960年代左右為止，社會主義的勢力波及全球，所謂「歷史站在社會主義一邊」的說法並不是天方夜譚。毛澤東說過「東風壓倒西風」，在當時的形勢下，這句話倒不見得是個空洞的政治口號。

但是，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這一批判是否徹底姑且不說）揭發了在斯大林統治下的殘虐行為，使「理想社會」的內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接着有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1979年以後的入侵阿富汗事件、1980-1981年的波蘭事件，這一連串的事件使蘇聯在國際上威信掃地。進而，曾經被認為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的計劃經濟（指令型經濟）也逐步顯現出其局限性。

法西斯主義、羅斯福新政、還有戰後的福利國家，全都是以不同的方式接受社會主義影響的嘗試。到1960年代左右為止，社會主義的勢力波及全球，所謂「歷史站在社會主義一邊」的說法並不是天方夜譚。毛澤東說過「東風壓倒西風」，在當時的形勢下，這句話倒不見得是個空洞的政治口號。

批判斯大林之後的蘇聯和東歐，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方面都有種種改革的倡議，也有一定程度的實踐嘗試，在一定範圍內，「社會主義復興」的希望甚至還呈燎原之勢。但是，對於革故鼎新的期待逐步為失望所取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其外部的一部分人中引起了狂熱、在更多的人中引起了抵制，從而加深了社會主義觀的裂變。但是，毛澤東逝世後的中國顯然已經不再是那個提出「與蘇聯模式迥異的新的社會主義模式」的中國了。

就這樣，70年代以來的社會主義對於其外部世界已完全失去了魅力，而被看作與停滯和壓迫聯繫在一起的典型。8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革的嘗試（特別是蘇聯的「重建」）一時喚起了對於振興的期待，但結局還是失敗了。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之間，蘇聯東歐陣營終於瓦解<sup>④</sup>，誰也未能預料到這一分崩離析的具體過程。不過，從70年代到80年代這段期間，「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感覺雖然還有些隱隱約約，但卻已經可以意會言傳了。許多人對於蘇聯東歐的迅速解體並帶有戲劇性表示驚異；其實一種體制從不能獲得民眾支持之時起就已經開始衰弱了，曾幾何時它的崩潰被廣泛認為只是或遲或早的問題，因此蘇聯東歐的解體並不是那麼出乎意外的事。由此可見，對於社會主義的看法可以大致區分出1960年代以前的「上升階段」和1970年代以後的「下降階段」。當然，這樣的區分只是為了便於簡明扼要地討論問題，如果深究細節可以發現還有不少出格的現象。

實際上，即使在所謂「上升階段」的期間，社會主義也或多或少存在着陰暗面，不少人早就注意到這些消極因素。特別是有關斯大林時代的暴政的消息，在其外部世界也有所傳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大，在許多東歐國家看來顯然是「外來的」強制。但是，1930年代的局勢是「法西斯主義對反法西斯主義」的決戰壓倒一切，蘇聯被看作「反法西斯主義的堡壘」，因此，在西歐的「進步的」知識份子（例如羅曼羅蘭等）中，對蘇聯內部的陰暗面視而不見的觀點取得了優勢。另外，東歐戰後的社會主義化雖然是蘇聯的軍隊從「外部」強加的，但是東歐各國「內部」也並不是沒有箝食壺漿以迎之的勢力。最有象徵性的事實是，德國的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波蘭的藍戈（Oskar Lange）、匈牙利的盧卡契（Georg Lukács）等並非教條馬克思主義者的左翼知識份子紛紛自願從流放地回國投身於各自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至於像中國、南斯拉夫那樣的不依賴蘇聯軍隊的支持、全靠自己的力量從「內部」實現社會主義化的國家，社會主義與民族解放相結合而享有崇高的威信。總之，「上升階段」的界說雖然不是無條件的，但大致上是妥當的。

再說「下降階段」，其下降也不是急轉直下。1973年以後全球性石油價格的上漲對於產油國蘇聯十分有利，得以掩飾它的經濟停滯。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至少在表面看起來強大而安定，因此，即使反體制勢力也傾向於考慮在體制內進行部分的改良而不是徹底推翻體制。然而，這種只補天不拆廟的選擇只是出於無奈，並沒有積極進取的氣象。其實，事到如今，就連統治當局自身也不再具備對既存體制的優越性的確信了。雖然上述兩個階段的區分稍嫌粗疏，但是就基本趨勢而言是可以首肯的。那麼，經過這兩個階段的社會主義觀的變化，在整個世界史的大背景下應該如何定位呢？

社會主義的發展，大致可分為1960年代以前的「上升階段」和1970年代以後的「下降階段」。實際上，即使在所謂「上升階段」的期間，社會主義也或多或少存在着陰暗面。但是，在「進步的」知識份子中，對蘇聯內部的陰暗面視而不見的觀點取得了優勢。

## 四

在這裏，我試圖提出一個假說，把十八世紀以來的「近代化」和十九世紀以來的「組織化」這兩大趨勢作為近現代世界史的基調，在兩者的重疊和更替之中來把握社會主義的命運。首先讓我們來考慮十八世紀以來的「近代化」時代的內涵<sup>⑥</sup>。在這一時代裏，後進國（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的德國、日本、俄國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為了趕超先進國（歐美各國），把「近代化」作為至高無上的目標，為了實現該目標可以不計成本和犧牲的觀念被認為是正確的。作為「近代化」的推進者，尤其是在後進國中，政府發揮了重大的功能。「近代化」一方面加強了人的理性、科學、技術的作用，另一方面由強有力的政府所主導的近代化意味着啟蒙主義的理性與權力的結合——這裏存在着悖論。結果，進步觀念的普及和以此為正當化理由的殘虐行為的橫行就成了「近代化」時代的最大特徵。

其次，十九世紀末以後「組織」的作用增大，世界進入了被稱作「組織化的時代」的階段。「組織」既是「近代」的產物，同時也是推動「近代化」的特殊方式。從產業化、都市化等狹義上說，「近代化」得到了「組織化」的有力促進；然而，如果在經典的意義上把個人主義、市民社會作為「近代」的特徵，那麼「組織化」就成為削弱近代的基礎的力量。由此可見，「近代化」與「組織化」既矛盾又統一，具有相反相成、互補互強的辯證性共生關係。這種狀況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得到加強，至1930年代達到頂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仍持續了數十年。因此，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的這段時間可以說是「組織化的時代」，也可以說是「近代化」與「組織化」相交織的時代。

然而，從1970年代的某一刻起，「近代」的價值漸漸受到人們質疑。雖然後近代論的內涵現在尚不甚了然，但許多人都在思索「近代之後」，對於歷史將邁入新階段的預感在擴散、在印證。社會經濟方面的「近代化」（產業化、都市化）固然還沒有終結，卻已經失去了作為普世福音的輝煌。作為「近代」另一支柱的「民族國家」雖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但已喪失了往昔的絕對權威，在許多場合正在相對化——對「民族自決」的局限性的指責時有所聞，民族國家受到向上（國際組織）統合與向下（地域）分權的夾擊，經濟的無疆界化使「國民經濟」的框架日益含混，這一切都足以為證。

本來就不會有甚麼明確的界標來表示「近代」到底從何時起告終，何況對於「近代」之後究竟是「近代」的終止還是「近代」轉入更高級階段的問題也有不同的意見，因而，「近代之後」在世界史上的意義還不能「蓋棺定論」。不管怎樣，把二十世紀的晚期理解為用各種方式反覆試行「從近代到後近代的過渡」的時代總是可以的。另一方面，到了1980年代前後，「組織的局限性」也成為議題。特別是大規模的等級組織的低效率問題被指出來後，人們開始重視小規模組織及其彈性結合的網絡結構的意義。信息處理技術的發達，促進了從集權管理到分散管理的轉變。小規模組織以及網絡結構究竟是超越「近代」（承載後近代）的社會形態，還是使「近代」的價值在新的條件下轉化再生？對此存在着相反的意見，一時

在十八世紀以來的「近代化」時代裏，後進國為了趕超先進國，把「近代化」作為至高無上的目標，為了實現該目標可以不計成本和犧牲的觀念被認為是正確的。結果，進步觀念的普及和以此為正當化理由的殘虐行為的橫行就成了「近代化」時代的最大特徵。

不容易得出結論。然而，不斷推進大規模組織化並以此為進步的想法的確已經成為「明日黃花」。正如前面指出的，「近代化的時代」的暮色在二十世紀的後期漸趨濃鬱；與此相映成趣，「組織化的時代」也在二十世紀的最後20年裏露出秋意。

總之，「曆書之外的實質上的二十世紀」，與其說是從1914年到1991年，毋寧說是從十九世紀末期（大約1870-90年代）到二十世紀末期（大約1980-90年代），其內涵的基本特徵是以「組織化」來推動「近代化」的趨勢。從而這個世紀末的特徵也就表現為：十八世紀以來持續至今的「近代化」的限度已經顯然，十九世紀末以來持續至今的「組織化」開始剎車。

在這樣廣闊的背景中進行考察，可以斷定「現存的社會主義」正是以「組織化」來推動「近代化」的嘗試中最極端、最徹底的實例。晚年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紀末注意到「組織化」的初期徵候，視之為社會主義的胎動。列寧也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統制經濟中看到了「邁向社會主義」的趨勢，這並非他一個人的心血來潮。帶有更濃厚的烏托邦色彩的其他社會主義者，在認為「組織化」進展的結果導致社會主義這一點上也並無不同。托洛茨基也罷、布哈林也罷，對此都持相同的看法。即使是作為布爾什維克的異端的波格丹諾夫的思想，甚至包括屬於「俄羅斯先鋒派」的藝術家們在內，當時都沒有跳出那樣的窠臼；相反，到處充斥着無條件地把科學、技術、工業發展、組織化等看作進步，並把社會主義當作諸如此類「進步」的體現者的觀點。更廣義地說，無論蘇聯的內部還是外部，對於科學、技術、組織、進步的信仰都吸引了大多數人；這樣的時代被稱作現代。布爾什維克主義正是那個時代的最極端、最敏銳的體現者。

蘇聯的歷史是曲折的，特別是斯大林獨裁的時代與其前後的時代之間有沒有連續性。換言之，斯大林時代究竟是社會主義的典型現象、還是社會主義歷史中的脫軌異端這樣的問題，不斷引起人們的熱烈爭論<sup>⑥</sup>。從微觀層面來看，蘇聯的70年的歷史當然不能粗暴地一刀切，其中自有種種斷裂和轉換。然而，從宏觀層面來看，任何時代都有獨自的烙印，要否定這種特徵的一貫性是很難的。的確，斯大林時代的幾個基本特徵——例如極端化的個人崇拜、比比皆是的專橫跋扈——在其後的時代裏大大縮小了規模，據此也可以說那些都是特定情形下的個別現象。但是不能不承認：自詡為「新文明的建設者」、迷信科學技術和組織的力量、運用中央集權的組織來強迫推行各種政策，這些卻都是蘇聯歷史的一貫性特徵。

有這種問題的不僅僅是蘇聯（以及被迫接受「蘇聯式」社會主義的東歐各國）。即使像南斯拉夫和中國那樣抵抗「蘇聯模式」而採取別的方式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也都具有與蘇聯同樣的基本特徵。其實，社會主義陣營以外的國家雖然對於布爾什維克實驗的過激現象不以為然，但在「近代化」和「組織化」成為時代潮流的條件下，它們又怎能完全做到「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呢？君不見，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是也反覆出現過對於「自由而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憧憬和導入「計劃經濟」因素的嘗試嗎？就發展中國家而言，「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顯得更有魅力。連社會主義各國內部的反體制派也以「富於人情味的社會主義」為目標，而不是全盤否定社會主義。所有這些都表明，在一定期間內，「社會主義」確實被認為是符合時代潮流的。應該說，這恰恰是二十世紀的一大特徵。

「曆書之外的實質上的二十世紀」，是以「組織化」來推動「近代化」為特徵的，而「現存的社會主義」正是這個嘗試中最極端、最徹底的實例。自詡為「新文明的建設者」、迷信科學技術和組織的力量、運用中央集權的組織來強迫推行各種政策，這些都是蘇聯歷史的一貫性特徵。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可以認為現存的社會主義曾經走在那個時代的最前列，並且集中地體現了該時代的特徵即所謂「時代精神」。不過，話僅僅到此為止，無非指出了一般的「時代性」，至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獨一無二的個性則掩隱其中，還是不明確。在這裏需要注意的是，社會主義國家雖然與其他國家共同體現「時代性」，但卻走到極端，把它推行得最為徹底——這正是社會主義的獨特個性的所在。毋庸贅言，「走到極端，把它推行得最為徹底」的說法，並不意味着把它真的實現了。過於極端化的舉措，反而使正式的制度與非正式的實際之間的乖離日甚一日，造成物極必反、事與願違的結局。在這樣的過程中，權力運作與社會主義之前的傳統文化的勾結也是題中應有之意。對於(舊的)社會主義各國的現實，不僅要看表面性的正式的制度，還有必要包括非正式的實際，從整體上加以把握⑦。

在上述意義上，以「組織化」推進「近代化」的說法確實不足以完全概括「現存的社會主義」的實際，但卻在「組織化」和「近代化」走向極端這一點上入木三分地刻劃出其基本特徵。對於社會主義嘗試的局限性和缺陷的批判一直就沒有間斷過，可是在時代大趨勢之下對它無法完全否定(至少無法作壁上觀)，這正是二十世紀之所以為「二十世紀」的特徵。

不過，到1980年代前後，潮流出現了逆轉。「近代化」和「組織化」都不再是有吸引力的目標，前面所說的那樣的「二十世紀」已經在閉幕。蘇聯東歐陣營的解體，可以作為這一世界史上的大轉折的標誌。與蘇聯東歐的崩潰幾乎同時，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關於「市場的復辟」的論調甚囂塵上，發展中國家也把注意力從「社會主義模式」轉移到市場型發展模式上去。這是席捲全球的大趨勢。在蘇聯東歐陣營裏，許多舊體制的精英以徹底不抵抗的姿勢迎接體制轉變，不僅如此，舊的特權階層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人還喜孜孜地搖身一變成了「新生資產階級」；事實說明，即使在「居廟堂之高」的袞袞諸公中也缺乏堅持社會主義體制不動搖的信仰心。中國、越南等國採取了把共產黨領導與向市場經濟過渡相結合的政策，這可以理解為社會主義時代的統治階層試圖適應資本主義以求生存(在這一點上頗有啟示性的是，舊蘇聯的中亞地區的當年的共產黨領導人們，至今仍留在採取權威主義方法來推行資本主義化的政權中安然無恙)。

與蘇聯東歐的崩潰幾乎同時，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關於「市場的復辟」的論調甚囂塵上，舊的特權階層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喜孜孜地搖身一變成了「新生資產階級」；事實說明，即使在「居廟堂之高」的袞袞諸公中，也缺乏堅持社會主義體制不動搖的信仰心。

## 五

總而言之，社會主義體制是作為一種世界性潮流的最極端、最徹底的試航而出現，隨着這一潮流的逆轉而覆沒的。由於歷史從來就不是封閉系，所以在展望未來時遽下斷語是輕率的。無論「近代化」抑或「組織化」，雖然失去了昔日的輝煌，但還沒有完全終結，更沒有銷聲匿迹。就是方興未艾的「市場的復辟」，一度放聲謳歌市場萬能論的禮讚，現在又放低了調門，人們重新開始認真考慮市場的局限性問題。儘管如此，要回歸到過去那樣的社會主義基本上是不

可能的。雖說市場並非萬能，但卻找不到可以取而代之的東西；這樣的不透明感，正是最近事態的特徵。

一個時代結束之後，甚麼樣的時代將會到來？這誰也無法預測。過去時代的基本特徵即使失去了從前那樣的核心性意義，其各個組成部分仍然有可能在新的條件下存續。就社會主義而言，大概是不會再原封不動地重複過去的實驗了，然而類似的思想仍可能贏得人心。「作為思想的社會主義」在與「現存的社會主義」相區別的基礎上，或許還能延年益壽。因為，對於在自由競爭中失敗的弱者的關注、對於平等的追求等價值也不是那麼簡單就會消失殆盡的東西。另外，如果說十八世紀以來的產業文明到了轉折關頭，那麼對於效率主義或許也得重新認識。這樣一來，僅根據「效率」的標準來對社會主義斷罪的議論也要捉襟見肘，而「效率」這一標準本身最後難免要被重新審視（順便指出，本來既存的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大半都沒有越出「近代主義」的雷池，因此，社會主義並沒有資格誇示自身在邁向「近代之後」的時代這方面的先驅性）。

由此可見，對於今後的歷史進展還有必要在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上持保留態度，但無論如何，十八世紀以來的「近代化」和十九世紀以來的「組織化」這兩大潮流現在已經到了一個轉折點；可以斷言的僅此而已。以最極端、最徹底的方式體現了這兩大潮流的社會主義的崩潰，對於現代這個時代的理解具有重大的意義。

季衛東 譯

一個時代結束之後，甚麼樣的時代將會到來？這誰也無法預測。就社會主義而言，大概是不會再原封不動地重複過去的實驗了，然而類似的思想仍可能贏得人心。「作為思想的社會主義」在與「現存的社會主義」相區別的基礎上，或許還能延年益壽。

### 註釋

- ① 這一觀點是由我在《甚麼是社會主義》和《甚麼是蘇聯》（均由勁草書房在1994年出版）中提出的。
- ② 最典型的例如：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London: Abacus, 1994).
- ③ 例如，佐佐木毅：〈試論二十世紀型的體制〉，載《思想》，1995年10月號。
- ④ 關於這一過程，參閱鹽川申明：〈重建、東歐動盪以及蘇聯解體〉，載《世界史講座》，第11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6）。
- ⑤ 「近代化」意味着甚麼，這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在此無法深入討論。暫且把產業化、都市化、民族國家化作為「近代化」的主要內容來考慮。此外還有把諸如個人主義精神的普及、獨立於國家的市民社會的成熟等作為近代社會的重要指標的觀點，都存而不論。
- ⑥ 參閱鹽川申明：《蘇聯的歷史在終結》（東京：朝日新聞社，1993）。
- ⑦ 試從這一觀點來把握「現存的社會主義」的有：Nobuaki Shiokawa, "Toward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Socialism That Really Existed'", in *Socio-Economic Dimensions of the Changes in the Slavic-Eurasian World*, eds. Shugo Minagawa and Osamu Ieda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1996).